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

O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KENNETH J. ARROW

编者按 肯尼思·艾若 (Kenneth J. Arrow) 是美国最享盛誉的经济学家, 斯坦福大学教授, 曾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因他在经济均衡和福利理论方面的贡献, 1972 年获诺贝尔奖。主要著作有《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存货与生产的数学研究》、《线性与非线性计划研究》和《组织的极限》。1979 年, 作为美国经济学会成员, 他访问了中国。本刊编委、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研究室主任邹至庄 (Gregory Chow) 教授, 在 1980 年来中国讲授数理经济的归途中访问了艾若教授。他们就中国的经济效率、价格政策、外汇汇率、农产品价格和经济人才培养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繁荣经济的中心问题是经济效率 (= 产出 / 投入)。为此必须有一个客观的、能够反映当时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价格 (包括外汇汇率) 来计算投入和产出。在此基础上, 企业的效率可以用利润 (= 产出一投入) 来衡量。为了以最少的投入为社会谋取最多的产出, 企业要能够根据具体条件选购原料、选择和激励职工、调整产品规格品种, 而不是盲目追求硬性的产值产量指标、生产大量销不出去的产品。这必须采用市场机制, 扩大企业自主。

如何在计划经济下采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 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马克思本人未及研究, 苏联和东欧有过一些探讨。际此历史性的转变时期, 艾若希望中国人及时研究经济学中关于资源配置、效率、边际分析, 包括不确定性、信息流等等的理论和经验, 深刻认清当前的变革在经济学上的深刻内涵, 表达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关心和期望。

到处可以听到 要求改革的呼声

邹: 根据你在访问中国时所了解的情况, 可否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

艾若: 我们在中国只是短暂而表面的一瞥, 远非学术考察。根据我们的观察, 中国的生活水准与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相比, 还十分低下, 但中国的组织程度却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高。一般说, 中国领导人很了解面临的问题。看来至少他们了解到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意义, 在制订发展计划中, 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某些细小而不重

要的方面, 可以认为中国有着迅速发展的良好基础。比如, 卫生搞得很好; 没有某些发展中国家那种显而易见的失业现象; 按先进国家的标准, 住房很挤, 但总还是有房子住; 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 城市因充塞着无事可做的人而过分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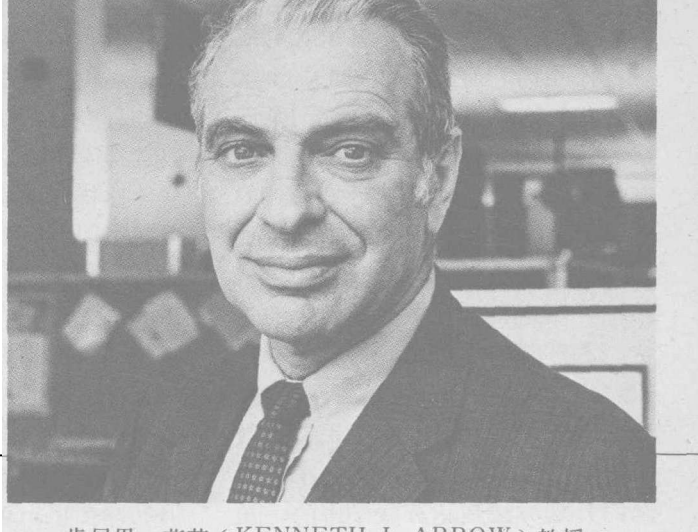
我们比以前较为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在不运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是如何使各种经济活动协调配合的。在美国, 这种协调配合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在中国, 则由领导部门指派和直接分配。对面临的技术问题和组织问题, 中国人有目的感, 有充分的认识, 还有积极的自我批评精神。他们对原材料利用、特别是

劳动力使用方面的浪费和低效率的现象展开讨论, 以便摸索出一套新的路子, 到处都可以听到要求改革体制的呼声。

美中两国的农业, 差异很大。因为中国人口稠密, 到处看到有一大群人在地里劳动。同样的作业, 在美国只要一个人和一台拖拉机以及各种作业机具就行了。在中国常常可以看到牛车和拖拉机同时干活, 这说明他们并没有错误地立即废弃所有旧的生产手段。但是, 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中国在某些工业部门中, 资本密集度 (capital intensity) 过大, 他们把繁荣与先进技术等同起来, 因此竭力想引用

邹至庄 (Gregory J. Chow) 著名计量经济学家,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经济研究室主任, 台湾经济顾问, 本刊编委。

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效率



肯尼思·艾若 (KENNETH J. ARROW) 教授

肯尼思·艾若教授

ARROW

邹至庄

最先进的技术，而没有认识到，那些适用于资本——劳动比率 (capital-labor ratio) 高的国家的东西，未必适合资本——劳动比率较低的国家。我们看到一个由日本工程师安装的自动化轧钢厂，用人极少。我认为中国应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更为合理的技术水准。

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效率

邹：你刚才谈到中国领导人很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按照你的观察，都是哪些问题？

艾若：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效率 (economic efficiency)，也就是以一定的投入 (input)，取得更多的产出 (output)。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生活水平。人们感到生活水平过于低下。他们充分认识到，在一定经济效率的条件下，资金积累 (Capital formation) 和消费 (consumption) 之间存在着互相消长的关系。这是两个最基本的经济问题。为了提高效率，还有组织问题以及必须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当前中国关于四个现代化的一些新口号，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来的。为了提高效率，人们强调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不大了解他们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些概念的含义。总之，他们要求改革，同时需要用一些口号来表达这种改革，但对这些口号的内涵

可能还不很清楚。

邹：我想该与你就效率问题和组织问题进一步谈谈。中国人试图不用自由市场 (free market) 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我认为，一个企业的效率也就是产出的价值同投入价值之间的比例，因此与效率最紧密联系的是价格。不通过市场，如何能确定投入和产出的价值呢？如果价格是主观任意确定的，那怎么能用来计算效率呢？

艾若：是的，中国主要产品的价格，据说差不多二十五年没有变动了，这些价格已经不反映经济活动中需求的变化。他们与我们同样面临通货膨胀 (inflation) 的问题，可是他们采用与我们相反的办法来对付。据我的印象，他们并不考虑商品间相对价格的变化，他们真正担心的是通货膨胀，即物价普遍上涨，因此力图保持总价格水平也就是绝对价格水平的稳定。有着四十年代通货膨胀的痛苦经历，他们自然很警惕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和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保持总价格水平的稳定性 (stability) 和个别价格的灵活性 (flexibility)。要使物价的平均水平不变，而又允许个别物价变动，这没有简单的办法。他们稳定物价的总政策，是固定绝对的总价格水平。我怀疑他们是否意识到保持总价格水平稳定，而改变相对价格的可能性。1979

年，农产品提了价，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较大的变动，以西方的标准看，提价20%，幅度并不大。

要用价格来计算效率，还有一个利润 (profit) 问题。利润就是产出价值比投入价值多余的部分。如果投入和产出都用合理的价格而不是人为价格 (artificial price) 计算，利润就可以正确地反映企业的效率。在中国，衡量企业的效率，总共有八、九个指标，比如产量、消耗定额等。就多数企业来说，利润是次要的，产量仍然是最重要的指标，超产5%以上，就可发给奖金，超产部分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出售，可以由工厂甚至车间一级自由支配。在衡量效率时，产量比利润更为重要，这一点使人难以理解。

邹：追求产出，难道不考虑投入的多少吗？

艾若：投入是有定额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出就不是独立的指标。投入既有限制，就不能要多少给多少。对于用以降低成本的各种不同投入之间的相互取代，还缺乏奖励政策。比如，耗电量和劳动量是分别限定的，在企业经理这一级，如何相互替代不同的投入，以达到最少的消耗，就很难办到。一般说来，企业总有好几种产品，加上价格又有很大的任意性，那么，用产值或产量作为主要指标来考核企业的效率，就很成问题。企业只要生

产那些产值高的产品，就很容易实现产值指标。而且要规定每一个工厂的具体产品，中央计划部门是无法胜任的，中央一级只能确定大类产品的计划，比如只能计划螺丝的产量，由于各种螺丝的规格、品种太多，就无法规定六角螺丝的生产指标。因这种计划方法而造成的浪费，在苏联是出了名的。规定一个工厂生产钉子，如用重量计算，这个工厂就生产大钉子；如用钉子数量来考核，就生产很小的钉子。中国的计划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受这个框框的影响，基本上是苏联的模式。中国人同俄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我感到在官僚式的管理体制中，中国人似有更多的灵活性。

市场机制与计划制度 并非不一致

邹：你的看法是一些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机制的含义并不真正了解，可否请你予以解释。

艾若：事实上，他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真正的市场机制就是允许企业的经理人员愿意把产品卖给谁就卖给谁，选择能获得最大好处的买主。这与计划制度并不是不一致的，但需要较多的经验和技巧。这是一种只规定标准和要求，但不确定具体数量的灵活的计划。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运用这种灵活性，但从整体说，还是有困难的。消费品的生产就可以这么办。如缝纫机工厂因需求增加而增产，愿意出较高价格购买钢铁，钢铁厂就可以把原来打算卖给冰箱工厂的钢铁卖给缝纫机工厂。这意味着缝纫机工厂和冰箱工厂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而不完全受计划的控制，但效果良好。

邹：请你就这个问题继续发挥。怎么确定产出和投入的价格呢？市场机制是否意味着企业经理人员可以自行定价呢？

艾若：有许多可行的办法。一种办法还是由主管价格部门集中规定产品价格，但他们有很大的灵活

性，随时准备调整价格，供不应求时提点价，供过于求时则降点价。另一种办法是让工厂定价，买主可以选择卖主，犹如卖主选择买主一样，这样企业之间可以竞争，就很灵活了。这种办法自然引伸出一个激励（incentive）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利润作为激励，用来评价企业经理人员，他们就会很关心企业的利润。当然利润并不属于企业经理人员所有，比如美国公司的经理人员就不是利润的所有者，但利润多了，可以增加报酬，所以他们竭力争取更多的利润。可以设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仍然是评价企业经营好坏的基本标准。

由谁来决定职工的工资？

邹：赞成你的见解。还有一个雇佣和辞退职工的自主问题，必要性怎么样？由谁来决定职工的工资？

艾若：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都至少有两个经济部门——工业和农业。工业的工资水平总数高于农业，这对于吸收农业人口转向工业是必要的。可是据我所知，在很多国家中，工人的收入都不必要地比农民高得太多。按中国现有的工资水平，如果允许谁都可以当工人的话，将会有大批农民涌向城市。有趣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却正是1950年前日本曾发生过的。总的感觉是，中国工业部门的报酬水平与农业相比，有些偏高。

邹：你的这些意见的前提是，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工资标准，对吗？

艾若：我讲的是现实情况。可以设想，工资由企业确定，仍然会高于农民的收入。

关于职工的自由流动

邹：我们一开始就谈了企业自主问题。现在假定已经存在一个由中央政府规定或由市场规律逐步形成的一个工资标准。问题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是否有权确定某一

职工的工资。我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围绕着什么是市场机制这个总题目。

艾若：从企业内部说，使企业经理拥有更大权威来分配或安排职工的工作是必要的，尤其是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而论。据我了解，企业中人员都是由上级分配的，企业也不能辞退工人。有人说，这是“铁饭碗”，意思是有了工作，就永远也打不了饭碗。值得研究的是，在日本的一些企业里，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在试用考察期满后，职工是不能解雇的，而日本的管理人员从不抱怨因推行这种办法而使劳动效率降低。所以这种办法并不一定造成低效率。

邹：选择人员，经过试用考核，给予职业保证，这是一回事；由别人把人员分配给你，这是另一回事，两者是有很大不同的。

艾若：像中国这样正在发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指定分派人员，即使从效率这个角度来考察，也是必要的。比如，这样可以避免人员过分集中到条件优越的地方。在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医生愿意到条件好的地方去，而不愿到有病人但条件差的地方去。

邹：美国医生的供求关系有人为的限制。如果不加限制的话，不会发生这类问题。让我们继续谈市场机制吧！由企业经理人员确定劳动力使用的数量，是否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艾若：这既是对经理人员说的，也是对一般职工说的。在企业内部，需要有一个权威来调派职工，以便最有效地使用他们。另方面，也要建立一种使经理人员对于企业经营成果负有责任的制度。还应该形成一种能够左右企业管理权力的对立面，否则，可能会出现一种不仅是不民主，而且是低效率的权威。

邹：我正要请教你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就是企业职工是否具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在当前体制下，一些青年被分配到他们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岗位上去，是不是应

该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艾若：这要看条件。在任何社会里，因为缺乏机会的缘故，人们往往从事他们不喜欢的工作，或者说并不是多数人都能从事他们喜欢的职业。倒不是因为有谁强制他们，而是限于他们的能力、训练和社会需要等等条件。前几年，一部分美国青年想搞手工艺，但收入高的手工艺者数量甚少，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于是，大多数人不能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不得不从事他们不爱好的职业。不论在什么社会制度里，总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更多考虑的是效率问题，怎样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用什么激励使他们工作得更好。在当前的条件下，对职业的选择和流动问题，我考虑得较少。将来经济发展了，社会更加多样化了，这个问题也许会尖锐起来。而现在，中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比较低，这个问题并不尖锐。

邹：同中国人交谈以后，我感到有些青年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没希望，对他们的前途缺乏信心。这里就必须考虑激励的问题。

艾若：是的，你说到的两个问题，必须加以区别。一个是激励问题，另一个是工作调动问题。激励问题更为尖锐。在中国，我听到许多人，包括一些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低效率颇有意见。我相信，情况是真实的。经济工作中各级管理人员，特别是同广大职工直接接触的中级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是很重要的因素。调动职工积极性，不光是经济激励，领导人员直接的鼓励也是必要的。许多单位都提到，现在管理水平太低，显然，各级管理人员缺乏良好的训练机会，不通晓或完全不懂得自己从事的业务，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职工的积极性。

怎样确定合理的价格体系？

邹：请你进一步阐述价格问题。

如果不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怎样确定合理的价格体系呢？

艾若：好，前面说过，一种办法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如莱纳（Lerner）、泰勒（Taylor）、兰格（Lange）等人屡次提出的，用人为市场（artificial market）的办法来调节。在这里，允许价格变动，当供求关系不平衡的时候，调整价格。对于管经济、管生产的人，价格是个信号。当某一产品的价格上涨了，就要多生产这种东西。应当允许价格的浮动和相对价格的时时变化。

邹：你也许了解，某些消费品如计算器、电视机、录音机的价格，中国五倍于香港。反过来讨论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控制人民的消费，不照顾他们的利益，能坚持多久？这也联系到激励的问题。计算器、电视机和大米的比价，五倍于世界别的地方，这是合理的吗？

艾若：因为食品是配给的，情况比较复杂。问题可能不在于电视机价格太高，而在于大米的价格太低，其他粮食、棉花、纺织品也都是低价限量配给的。我猜这些东西的非配给的价格就高了。

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增加国民收入的基本途径

邹：你说这些东西价格过低，什么原因？

艾若：依官方的想法，农产品低价是为了保持城市生活水准的低支出。显然，农业人口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少从原则上说（我不了解实际情况），它大大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农产品价格，会促进农业机械化，至少会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在中国，农业经济占85%的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增加国民收入的基本途径。说许多国家因工业化而发达起来，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只是一半真理。事实上，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也是由于农业生产率具有至少和工业同样的增长速度。在美国，农业

生产率是整个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和关键的因素。印度同美国正相反，十几年来，他们不强调农业生产率，结果是灾难性的。在这里，激励是一个重要问题。

以更大得多的规模进行进出口，对中国会比较有利

邹：在什么程度上，你认为外汇汇率也是市场机制的一个方面？

艾若：这是市场机制的一个基本方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些大型进出口公司同世界市场做生意，在外汇市场上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的力量，不管它们自己是否这样想。我认为它们应该逐步采用自然形成的外汇汇率。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国家存在的一个灾难性的问题就是采用人为的外汇汇率（artificial exchange rate）。那种以为发展中国家可以用人为的汇率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想法，是一种误解。根据大量的研究工作，自十八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的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在经济上并无益处，它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低效率和经济损失。理论上说，既然汇率是人为的，在国家里，可以用影子价格（shadow price）*来计算。实际上由于这种计算过于复杂，仍然只能用人工汇率来计算。这就歪曲了真相。本来应该进口的东西现在不能进口了，在国内建厂生产，经济效率极低，造成大量浪费。这种歪曲的影响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小地方，将会是一种灾难。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小得多，因为国内市场很大。但即使这样，只要进行外贸，仍然会出严重的问题。而我认为，以更大得多的规模进行进出口，对中国会比较有利。只要国内的相对生产率和资源分布和世界其他地方有差异，就需要进行贸易。当前，中国在外贸上还没有很强的相对优势。但事情在发展，在一些地方，将会取得优势。

* 影子价格即国际市场的自由价格。世界银行在向采用人工汇率的第三世界国家贷款投资时，采用这种影子价格来计算未来企业的投入产出和盈亏，以保证投资企业的成功。不采用其国内价格和人工汇率。

邹：你说不了解中国存在的相对优势。中国国内价格同世界市场价格的差别能不能认为这意味着相对优势呢？

艾若：国内价格应该指自由市场形成的价格，必须能够交换的那些商品，运输费用自然应该加以考虑，并不是所有的相对优势都能在世界市场上实现。象中国这样的低工资国家，传统出口产品是纺织品，纺织品出口生意是有希望的。还有特种手工艺品之类的产品，中国历史悠久，肯定有各种传统产品。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不能说具有很大的出口的可能性。有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很表面的。他们可能进口、出口各种商品，但目前并不明显。他们没有尚未开发的地方，有些农作物并不处于相对优势，黄麻、棉花也不足，中国农业的自然条件也不是很好的。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

邹：是否可以换个题目。你们访问中国，试图进一步扩大同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艾若：开展学术交流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你参加的在中国举办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第二个成果是十一月分举行美中两国经济学家讨论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会议。他们要派学生出国学习，要我们派人去讲学。今后沿着这条途径发展。显然，中国人并不象强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那样强调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他们派数以千计的学生到美国学工程技术，只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学经济技术。坦率地说，要使这些交流取得成果，需准备付出长期的努力。不管怎么说，西方经济学已有了高度发展的一套学说和方法，我们认为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都有价值。在中国这类经济学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它的指导并不多。东欧有这方面的研究，据我所知，最好的研究，是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如边际分析(marginal analysis)的方法，有的是很复杂的。苏联特别是匈牙利的文献，阐述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只是某一个部分，而不是经济学的整体。这些文献都没有传到中国，而那些懂得边际分析概念的，主要是三、四十年代在国外学习的少数人。文化革命使这些人都“靠边”了，不能发挥作用。总之，他们人很少。对于经济学方面的书报杂志，也很少订阅。

对现代方法正在研究的唯一地方是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搞的运筹学，有些人有相当水平。虽然名词不同，内容大体相同，如线性规划、随机系统……。我注意到有人正在研究制订投入——产出表，并用内插法补充缺乏的数据。

我看了中国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大量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叙述性的教材，还有经济思想的历史，也有一些关于西方经济思想的评论。在管理科学的课程表里，有一种叫数理经济学，大概是线性规划之类的内容吧！我们称为operation research，他们用数理经济学这个词，也许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当前各个大学正在弥补过去十年、二十年的空白，抓紧各项工作，而且吸收新的人员，开展新的研究。我认为前景是好的。真正的问题是，有些处于当权地位的人，对此尚不了解，有的甚至不知道需要学什么。说到利用市场机制，他们感到有必要这样做，但还不了解究竟是什么。

要点是关于资源配置、效率、边际分析这些基本原理

邹：你讲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请你谈一谈，学什么对他们至为紧要的。

艾若：首先要学习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的基本原理。用资本主义经济学，写出一本教科书，说明不同的经济结构，

这是困难所在。基本的经济模型(model)也是很重要的，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阐述，事例要恰当。我认为要点是关于资源配置、效率、边际分析这些基本原理。在一定阶段上，还要强调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灵活性(flexibility)的分析。不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研究，在美国尚未充分发展，如果我们只注意确定性模型(certainty model)，那是不够的。

资源配置是基本思想，这里包括最优化和平衡化。要研究各个不同部分的均衡(equilibrium)、协调(synchronization)和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等问题。这是课程表中的主要科目。自然，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学科，比如对外贸易。当然每个人都要学习中国现行的制度和办法，但更重要的是学习今后将要改进的东西。领导人员应当有这种认识。当前处于历史性的转变时刻，对中国人来说，认识这些改革，恰当时机啊！资源配置的基本原理，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带有根本意义的。

不确定性与信息流

邹：你用了两个词，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信息流，能不能给予具体说明。

艾若：好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渗透了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当一个国家正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预期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经济要变化，但又不确切了解这种变化，比如在规模巨大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肯定说这个或那个必将发生。计划不是现实，所以计划中特别是投资计划中，不确定性的分析是非常有用的。不仅是专门的公式，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应当加以运用。再说灵活性的问题，比如一种机器，可以这样设计，使用范围窄，但效率高，另一种设计使用范围广，但效率低。哪一种设计比较好呢？苏联历史上有

• 下接55页 •

报等。因为这种社区大学正在增长，且能满足先前不能满足的需要，所以也就不会受适龄人数减少的不利影响。

主要研究性的大学，和文科学院收纳中学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这些学校会保住他们入学人数，必要时，他们可以稍稍降低要求，以填满空额。选择稍差的文科学校，主要是私立的或隶属于宗教团体的，都会受到入学人数降低的威胁。他们多数只能有很少的学生，而学费是他们主要的收入。好学生都被吸收到有名的学校中去。在增加学生的竞争中，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公立中小学需求量低，先前那些师范学校和综合性学院也要走下坡路了。

学校的位置，对它的未来也有影响。南部和西南部的一些学校，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可能不错，因为工商和人员正在逐渐的从北向“日光带”迁移。

财政压力也是主因

财政压力将增加，通货膨胀降低了捐款得到的实际收入，又提高了学校费用，所以有些院校不管钱从

哪来都要。由于接受政府资助，一些私立学校丧失了自主权。

私立学校给美国的多元社会带来力量和多样性。因此应受到支持，但此种支持应以保持其独立性为限度。然而三千个高等学校，各有各的前途，并非只有由地区，类型以至人口变化来决定。每个院校都应采取正面的步骤以估计其各自的形势，确定目标，决定如何面对挑战。每个学校的未来是由他们自己掌握和创造的。学校和各州公立教育的领导人，现在可以作出什么调整，以对付将来人口的萧条；入学要求应做何种改变；招生工作应做多少努力；如何努力来保持住在校学生；应增删什么课程；而最重要的是应采取什么步骤来维护质量、完整性和动力。

在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要想生活不断的进步，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和更高的教育的人，这两者都是高等教育的成果。我们期待2000年以后会有更多的大学生，这就需要很好的学校和教师。最重要的是越来越相互依靠的世界，这是需要很有智慧的领导人来把它引向人类幸福之路。

(马希文译)



• 上接22页 •

过不少这类计划，工程项目很大，但对最终目标却不适用。可见决策错了，大错特错，浪费大量资源。南斯拉夫也有很多半拉子工程，代价很大。任何搞过基本建设的人都知道，建设成本在任何国家都难以定得很准，应该提倡小规模投资，即使搞错了，也只意味着小毛病、小损失。我认为这类观念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再讲信息流的问题，它牵涉到许多方面。最简单的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里，一个地方的信息不能在别的地方利用。每个企业对于本单位的问题和潜力总比别人了解得多，因此，应当有一种途径和方法，积累和交换彼此的信息。讲到计划过程的信息，最重要的是过去的成败，这是预测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往往强调建设新项目，忽视同类项目已有的经验教训，用自己乐观的估计，代替已有的统计材料和历史资料。

每个国家，特别是中央集中计划的国家，必须讲究系统评价(systematic evaluation)。比如厂址选择，经济、地理等条件，差别很大，应当选择不同地区做比较研究，

然后确定工厂建在什么地方。这就需要不同省市的相当详尽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资料，以便扬长避短，分析比较。

很明显，上海工业过于集中，据说产值占全国六分之一，真难以置信。为什么这样集中呢？简直难以置信。上海的人口只有全国的1%或1.2%。这是很特殊的集中。也许上海比别的地方效率高。但可以总结上海高效率的经验，进而发展另外的“上海”，而不是什么都在一个上海发展，上海不能再膨胀了。

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邹：在和的交流方面，你因为还有什么重要的课题可以作为下一个对等会议的课题？

艾若：我感到有两个，一个是劳工分配，一个是金融投资。投资的问题很重要，还从来没有讨论过。薛暮桥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银行要起强有力的作用。这很有意思。我认为银行可以参与投资的决策，这将增加企业在投资和当前计划方面的自主权。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的

作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有些国家如南朝鲜，已研究的很多——根据自由市场来决定利率。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投资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有责任和风险。一个人推动投资建一个大工厂，十年以后才看得出它是好是坏，那人可能已离去了。投资的反馈机制(feed back mechanism)和当前的管理不同，后者年底就见盈亏。投资要很久以后才见分晓，这其间会有种种的预料不到的变化，例如原料供应断了、某人发明了什么东西使市场转移了。银行参加投资，可以作为另一个决策者。在西方，有几种不同的银行体系，美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各不相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成功的故事。所以，即使同是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方法也不一样，主要是在远期、近期比例。要找出最合适的比例和最合适的方法。

邹：我们已经谈了许多问题，对于我们这次谈话，我很满意。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具有相同看法。你的见解极为深刻，我们的读者将受到教益，我代表编辑部对您表示感谢。

(张磐译)

